

建构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与 安徽区域文学

江飞

今天，我们重提“总体性”概念，不是为了重返过去，而是为了应对现在的问题，更是为了面向未来的召唤。毫无疑问，建构当代文学的总体性是当下“内忧外患”的文学现实和时代要求的必然。“内忧”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衰落，反抗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美学兴起，许多作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个体性、日常性、琐碎化、“小我”式的“微观叙事”，而逐渐丧失了对总体性、宏观性、史诗性的把握能力，不能再像柳青、赵树理那样，以宏阔深沉的历史感总体性、全景式地观照现实、表现生活，建立起地方与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联。事实上，正如卢卡奇所言，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种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缺乏总体性的现实关切，只可能呈现盲人摸象式的当代生活。“外患”指的是后疫情时代，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中华文明正积极参与到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肯定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质疑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在当代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的建构，成为其中的一种总体性、整体性、历史性的民族文学范式。一言以蔽之，建构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谓适逢其时，对内可以提升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和历史意味，对外可以促进“中国故事”“中国气派”的整体传播和价值输出，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建构性的思路 and 理念。

相较于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区域文学似乎是地方性的、局部的文学，但事实上，局部既是整体中的局部，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体，换言之，区域文学同样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意味和结构特点。以作为区域文学的安徽文学为例，在时代激变、社会转型、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大碰撞的“五四”时期和新时期，都是皖籍作家率先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比如在中国新文学草创之初，以胡适和陈独秀为首，安徽现代文学一马当先，引领时代风潮，在刊物创办、理论提倡和文学创作等方面开风气之先；到了新时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是第一部对“反右”扩大化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探索作品，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引起轰动，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如此等等。从安徽这片文化厚土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作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安徽文学”的区域性限制，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总体性。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文学浪潮，尽管从不缺少安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探索的身影，尽管也产生了石楠、季宇、潘军、许辉、许春樵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但基本上未能穿越“当代文学史”或“茅奖”严格的筛选和检视，仿佛游离在国家叙事的总体性视野之外。最近五年，在中国文联和作协以及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支持与努力下，安徽文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态

势，涌现出陈先发、李凤群、洪放、胡竹峰、余同友、曹多勇、陈斌先、刘鹏艳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一个在总体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审美风格的“文学院军”正在逐渐形成。

在今天，当我们思考当代文学总体性下的安徽区域文学发展的时候，既不能回避问题，更不能无视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区域文学发展中共有的问题。在我看来，要发展安徽区域文学，首先，我们需要建构总体性的“安徽文学”，整体性、历史性地合理评价安徽文学及其在中国文学结构中的贡献与价值，反思和总结某些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资源。比如，诗歌和散文的兴盛一直是安徽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早在1981年，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1978~1980年）评奖，在全部获奖的35人中，就有公刘、刘祖慈、梁小斌等6位安徽诗人。安徽诗歌散文作家众多，作品上乘，影响很大，这就意味着，尽管小说现在是“一超独霸”，但我们在大力发展小说的同时，也需要同步推进诗歌、散文的发展，而不能畸轻畸重。其次，我们需要正视当代文学总体性中所蕴含的差异性，正确看待安徽文学与长三角苏、浙、沪文学以及其他区域文学的差异与差距。只有看到差异和差距，才能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避免同质化，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安徽文学的区域优势，立足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和新安江文化，打造“徽文化”特色品牌，创造出“地方—中国—世界”三位一体的文学精品。再次，我们还需要正视安徽文学总体性中所蕴含的差异性。安徽文学不等于“合肥文学”，而是16个省辖地级市、9个县级市、50个县、1239个乡镇的文学的总和。行政区划的等级并不意味着文学发展的等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艺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个区域文学的健康发展，那么，各个区域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市县地方文学的健康发展。最后，无论是安徽区域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作家而言，归根结底都要从总体上辩证把握世界和历史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其实就是总体性的人，即具有多维需求的自然人、进行对象性活动的社会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无论在怎样的历史与现实、地方与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多维关系中，表现和培育“总体性的人”都应当是文学的根本任务，“文学是文学”的基本命题始终要坚持。

总之，个体与总体同一、自我与世界同一的“史诗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身处文明冲突与文明互鉴共存、建构与解构同在的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李敬泽先生所说的“整体性的关切，总体性的眼光”，以总体性为方法，重建文学整体性地把握历史、把握世界、把握人的能力，努力建设新的总体性的当代文学和区域文学，在二者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同光十三绝”戏曲人物画像局部图（右二：程长庚）

走近程长庚

——《京剧创始人——程长庚传》序

徐迅

读罢徐霁旻这部《京剧创始人——程长庚传》，我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不知道这“重负”从何而来，但从青年时邂逅程长庚这位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京剧创始人，莫名其妙地，他就成了我心里的一种牵挂。我曾参加过他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为他写过文章，甚至还把有关他的一些史料提供给一位朋友，希望朋友能为他写一部传记。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让徐霁旻完成了。他的这部《程长庚传》，在充分掌握传主有限的史料情况下，对程长庚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进行了忠实而艺术的描摹与刻画。当然，他撷取的还只是这位戏剧艺术大师生命的几朵浪花，但仅就这朵朵生命的浪花，却足以贯穿起他整个的艺术人生。从传记中，我们了解到京剧艺术的萌芽与起源、发展与繁盛，看到余三胜、张二奎、徐小香、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杨小楼……这些灿若星辰的戏曲人物，看到如何地众星捧月，看到程长庚的生命定格在红氍毹上，进而走近程长庚，从他的生命故事里感受他非凡的艺术情怀，体味一个平凡而伟大、卑微而崇高，寂寞而辉煌的艺术灵魂。人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程长庚在京都的舞台，融徽调、昆曲、汉腔于一炉，创造出伟大的京剧皮黄艺术，让人惊呼徽班“忽出一伟大艺人”，而被称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成为一代戏曲艺术的巨擘，这当然是伟大的。这伟大首先归功于他的天赋，归功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他是家乡这片皇天后土对戏曲艺术的莫大馈赠。

家乡这片厚土在诞生程长庚这位杰出的戏曲艺术大师之后，还贡献了张恨水这样一位文学大家。尽管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我二十多岁时才知道他们，但我都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在张恨水研究会工作多年，而在此之前，还因参与《潜山县志》的编辑“邂逅”了程长庚。徐霁旻先生在《后记》中说：“县志办的同志在王河镇程家井村发现了道光十二年《程氏家谱》与民国三十年《井股程氏支谱》”。那“县志办的同志”其实就是我。家谱是一种存在，谁都有发现的可能，但因此而结缘程长庚，却是我心里常常引以为豪的事。关于程长庚，张恨水先生也曾写过文章，大意是说家乡有三十六黄龙伞，但黄龙伞流于假，故只出舞台上的皇帝。梨园界把程长庚称之为“程大老板”，张恨水就以自己是“程大老板同乡”为荣。而我，也是以他们是我的乡亲为傲的。相信两位文学艺术大家的清辉四射，不断照亮家乡一代代青年才俊的心灵，给有志于文学艺术的家乡后学以力量。

我与徐霁旻同出潜山的徐氏一脉，若论起来他是我的长辈。我与他的交往少说也有二三十年了。我知道他从小就有着一个作家梦。后来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他幸运地工作在家乡文化艺术的一些部门……研究戏曲，研究文物，写戏，写散文，涉足传记文学创作，他一直孜孜追求，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这两年我就读到了他的长篇传记《皖江才女——葛冰如传》《乌以风传》《刘王立民传》等等，他深深根植在家乡丰厚的传统与地域文化土壤里，寻找乡贤们的足迹，在他们或平凡或传奇的人生中，凭借一种巨大的人文情怀的烛照，融史料与文学于一体，用艺术的丝线串起散落在皖西南大地上的一个个历史的珍珠，写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记文学创作风格。这是值得我敬重和不断学习的。

承蒙霁旻宗亲不弃，嘱为作序，在此不揣浅陋，聊举所感以报命。